

中国高等教育散论

纪宝成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高等教育散论/纪宝成.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3
ISBN 978-7-300-15221-9

I. ①中… II. ①纪… III. ①高等教育-研究-中国 IV. ①G6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28790 号

中国高等教育散论

纪宝成

Zhongguo Gaodeng Jiaoyu Sanlu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58 mm×236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23.75 插页 3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14 000	定 价	6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探索者、 改革者、实践者和思想者

——《中国高等教育散论》编者前言

—

高等教育是国民教育的最高层次，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职能，在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和谐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经过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改革发展和 1999 年开始的空前规模的大扩招，中国高等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成就显著，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一举迈入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我国高等教育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处于从做大中国高等教育向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转变的伟大时代。而这一实践和转变，也为高等教育自身的理论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素材和平台。

在世纪之交的十年和新世纪开头的十一年中，纪宝成教授作为一名中国高等教育的探索者、改革者、实践者和思想者，亲身参与、经历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性变革和跨越式发展。前十年，纪宝成教授作为政府部门的重要教育官员，先后担任商业部、国内贸易部教育司司长，国家教委高等教育司司长、计划建设司司长，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兼直属高校工作办公室主任，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方向和路径的一个探索者和实践者，高等教育政策和改革方案的一个制定者、执行者和推动者，同时，他还是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过程中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一个思考者、总结者和解答者。这个时期的一部分文章、

讲话和访谈，收录到《世纪之交的中国高等教育——规划、体制与发展》一书中。

后十一年，他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长，带领中国人民大学广大师生员工团结奋进、开拓创新，实施“十年基础、十年腾飞”的发展战略，启动并推进了中国人民大学建设“人民满意、世界一流”的历史进程，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赢得了师生校友的广泛赞誉。中国人民大学的改革发展成就也得到了社会各界和海内外的普遍认可和高度评价。纪宝成校长这方面的一些文章和讲话，收录到三卷本的《大学的探索》一书中。与此同时，纪宝成教授从一个大学校长、教育家和经济学家的视角，对宏观高等教育问题也进行了新的深入思考，作为一个专家学者、咨询者和建议者，既同过去有一脉相承的地方，又有不同于政府官员的角度和视野，对新世纪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具有新的价值、新的作用和新的启迪。这方面思考的一些成果和文章，收录在读者朋友看到的这本《中国高等教育散论》一书中。

二

《世纪之交的中国高等教育》、《大学的探索》和《中国高等教育散论》构成了纪宝成高等教育思想的主体部分。纪宝成高等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与纪宝成教授的个人经历、学识素养和工作实践是密切相关的。纪宝成教授 1966 年从北京商学院毕业后，大致经历了十年基层、十年教师、十年教育官员、十余年大学校长的职业生涯，期间的 1978 年至 1981 年，纪宝成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后留校任教。这一独特的知识背景、工作历练和人生历程，为纪宝成高等教育思想的形成、发展和特点，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纪宝成高等教育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成熟，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一）微观成型期（1981 年至 1991 年）：纪宝成教授 1981 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开始了高等教育界的职业生涯。他历任中国人民

大学贸易经济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在教学实践中，他善于理论联系实际，打通古今中外，注重教学法的研究和应用，因材施教，教学效果良好，深受学生欢迎，曾连续三年被学生评为“最佳授课教师”。他的科研成果也非常突出，并于1989年12月被破格评为教授，是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他重视教材建设，主持编写的《市场营销学教程》自1989年出版以来被广泛使用至今。1985年开始，他先后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教务长和教务长，负责招生、教学管理、学科建设、学生事务、对外交往等等，做了很多开拓性、创新性的工作，包括受国家教委委托主持经济管理类本科专业目录的修订。这十年的教学和管理工作的，使得纪宝成教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高等教育的微观层面有了切身的体会和思考，对大学的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问题形成了自己的认识和判断。

（二）宏观成型期（1991年至1996年）：1991年12月，纪宝成教授从中国人民大学教务长的岗位被任命为商业部教育司副司长（主持工作），半年后担任商业部教育司司长，又续任国内贸易部教育司司长，负责管理商业部和国内贸易部十几所类型不同的行业性高等学校和全行业系统的中等职业教育、成人继续教育。这段时期，纪宝成教授积累了丰富的宏观高等教育管理的经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关系，高等教育的结构、规模、效益的关系，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高校的运行机制，高校的学科建设、教学质量、学科专业设置，商科高等教育的发展等宏观和微观层面的问题都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思考和论述。这一时期，他关于高等教育的本质、功能、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以及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等方面的思想认识已经成型。比如，他从经济学的理论出发，较早地论述了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的公益性，提出教育不可能完全商品化、市场化，“完全用市场化那一套搞教育是行不通的”，“教育是需要通过政府来投资的，试图通过教育来挣钱是不行的”。这样的重要思想他一以贯之地坚持了二十多年，是他较早呼吁加大政府教育经费投入，反对教育产业

化、市场化、商品化。

(三) 全面发展期 (1996 年至 2000 年): 1996 年 3 月, 纪宝成教授调任国家教委高等教育司司长, 后任计划建设司司长,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兼直属高校工作办公室主任, 参与到世纪之交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火红的年代”、“战斗的岁月”当中, 完成了从行业性高等教育的管理者向整体的、宏观的高等教育管理者的身份的转变。这一时期是纪宝成高等教育思想全面发展的成熟期, 他关于高等教育的思想认识融入到他参与制定的改革方案、政策和实践中, 而他负责制定的政策和方案又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他的高等教育思想, 这是一个鲜明的特征。比如他创造性地提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计算方法, 既有较强的学理性, 又有很强的实践性和指导性, 这个计算方法是与国际接轨的, 并沿用至今。此外, 他提出了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必须树立正确的发展观, 并归纳出处理好十大关系, 涵盖高等教育的各个方面; 他在汹涌的市场化大潮中旗帜鲜明地反对教育产业化、市场化; 他清晰地梳理出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必须要解决好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学校、学校与社会以及学校内部的治理结构等四个方面的关系问题; 他系统地提出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要形成四个“三”的格局; 他较早地关注并论述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问题, 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等等。周远清同志曾对纪宝成教授这段时期的文章和讲话有如下评价: “是针对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和措施对策”; “包含着作者本人的理论探索, 体现着作者的理论勇气”; “有的讲话虽没有展开, 却包含着新思想的萌芽”。这些评价是准确而到位的。纪宝成教授一直站在高教管理体制理论探索 and 改革创新的前沿, 为世纪之交高等教育改革的突破性进展和跨越式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四) 深化丰富期 (2000 年至今): 2000 年 9 月, 纪宝成教授离开教育部, 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至 2011 年 11 月。在开展具体的办学实践, 办好人民大学的同时, 他继续对宏观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思考，对在实践中形成的高等教育思想进行了深化、拓展、提升和丰富。比如，他对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认识，上升到国家大政方针的高度，明确提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做强我国高等教育的大政方针”，而不仅仅是教务处长们所提的教学质量，使得人们对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更全面的把握，并从宏观发力和微观努力两个层面对提升高等教育质量进行了系统论述。他对教育产业化和市场化的思潮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剖析和批判，高高举起“为公立学”的旗帜，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坚持教育的公益性”，证明了纪宝成教授长期以来坚持反对教育产业化的正确性。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进入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纪宝成教授对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并提出了相应对策。他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将高等教育大众化看作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涉及社会的就业制度、就业观念、人事制度等方方面面。长期以来，纪宝成教授一直关注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变化趋势，对高等教育规模长时间快速增长的情况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他分析了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两个特点：一是以更快的速度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二是在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总结了大众化过程中出现的“三个跟不上”、“三个盲目性”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他提醒人们注意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建议采取“低速增长、稳步发展”的方针，注重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2006年11月，纪宝成教授应邀出席温家宝总理主持的教育座谈会，作为当时唯一在任的大学校长，他在会上就高等教育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发言。纪宝成教授还作为课题负责人和咨询委员会顾问，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制定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三

《中国高等教育散论》主要收录了纪宝成教授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期间关于宏观高等教育问题的部分文章和讲话，是其高等教育思

想深化丰富期的重要理论成果。这些文章和讲话涉及新世纪以来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多个重要方面，反映了一个大学校长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思考和认识，包含着深刻的思想和丰富的内容，提出了多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思路 and 方案，初步构建了富有特色、结合实际、符合规律的新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实践发展和理论阐述的体系、框架。综览纪宝成校长这一时期的关于高等教育的论述，可以发现其高等教育思想具有以下一些明显的特点：

一是立足基础性，彰显战略性。对高等教育基本制度、基本结构、基本功能的关注，对高等教育重大主题、重要问题和重点难题的关注，是纪宝成高等教育思想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纪宝成校长曾明确提出：“固然要关注教育技术层面的问题，但我觉得，要更关注教育的实质性和深层次问题。我们既要关注教育与整个社会的关系问题，也要关注教育本身问题；既要关注教育目前的一些问题，也要关注全社会长远、全面和根本的利益问题。”比如他建议将高教体制和科技体制统筹考虑，改变高教体制和科技体制“两张皮”的问题；比如他主张将高等教育分为“两个体系”（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实行“两个高考”；比如他将大众化高等教育视为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而提出一系列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建议；等等。正是这一系列的立足基础问题的“关注”，使得他对高等教育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宏观把握能力和分析能力，因而其观点和建议具有很强的战略性。

二是立足实践性，彰显旗帜性。理论联系实际，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在干中学，在工作中探索、总结、提升、创新，回应时代提出的重大实践问题，是纪宝成高等教育思想另一个鲜明的特点。正是因为关注实践，与实践关系紧密，才能紧扣时代的脉搏，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社会性，也很具有很强的旗帜性。比如，坚持教育的公益性，成为反对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一面旗帜；坚持教育经费以政府投入为主，社会筹集为辅，成为主张政府加大教育经费投入的一面旗帜；呼吁全社会重视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成为繁荣和发展人文

社会科学的一面旗帜；首创国学院，探索国学高等教育的理论和模式，成为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系统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面旗帜；深刻剖析市场经济对高校的负面影响，成为主张坚守大学使命，守护大学精神的一面旗帜；等等。这些无一不是高等教育发展乃至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大实践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梳理、反思和解答，也使得纪宝成校长的观点和主张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和公众认知度。

三是立足理论性，彰显一贯性。曾经有人以开玩笑的方式提出“纪校长反对纪司长”的说法。对此，纪校长自己做了解答：“我认为‘纪校长’和‘纪司长’本质上是一致的，观点是一致的。……众所周知，我当司长时，坚决反对国民教育的‘产业化、市场化’，反对‘一校两制’，坚持最基本的办学条件要求，在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的；而今天，我依然是如此，并没有发生‘纪校长’反对‘纪司长’。所以‘纪校长’很多时候都是赞同‘纪司长’的。”的确，纪宝成教授的基本思想观点具有长期的一贯性，能够在压力和风险面前坚持正确的主张不动摇。做到这一点，除了他本人的人品、个性和思想作风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的观点和主张能够实事求是，具有很强的理论性，符合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正确揭示了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和高等学校的办学规律，这一点在他近二十年来坚持不懈地反对教育产业化、市场化方面有突出的表现。此外，他对国际文化交流作为高等教育第四项职能的探讨，对大学“国际化”和“国际性”的辨析，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功能和特性的系统论述，对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概念和关系的研究，对“宁静校园”的阐释，对所谓大学“去行政化”的议论，对德育与智育的关系的把握，对大学文化传承创新职能的论述等等，都具有很强的思辨性和理论性，“看似平常却奇崛”，令人耳目一新。

美国学者布鲁贝克曾经把高等教育哲学分为两种：以认识论为基础和以政治论为基础。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趋向于把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作为目的”；而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则认为

“人们探讨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影响”。实际上，从布鲁贝克的论述中可以看到，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与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的关系并不是截然对立的，政治论的内涵，包含了认识论的成分和内容；认识论的取向，包含着政治论的目标和价值。在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上，这两种思想观点往往交叉在一起发挥作用，重要的不是采取哪种哲学理念，而是实现两者之间的平衡和交融。作为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一名探索者、改革者、实践者和思想者，纪宝成校长既不同于纯粹的书斋式的学者，也不同于教育行政部门的高级官员，他的高等教育思想，实际上就很好地体现了认识论和政治论这两种高等教育哲学的平衡和交融。他善于将高等教育的抽象理论和思辨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鲜活的实践相结合来探讨问题；他善于将个人全面、和谐、自由的发展同知识的创造、学术的繁荣以及国家社会的发展需要统筹起来考虑问题；他善于通过“大实话”提醒被忽略的常识，揭示被“窗户纸”遮蔽的真相，发现人们习焉不察的重要问题，纠正人们习以为常的认识偏差。而这些，或许正是纪宝成高等教育思想的魅力所在和动人之处。

目 录

当前发展高等教育的三项政策选择·····	1
关于邓小平高等教育思想的几点体会·····	9
关于增强大学国际性的几个问题·····	18
建设高层次人才队伍和高水平大学的思考·····	28
质量是当前大陆高等教育的最大挑战·····	43
实现研究生教育向质量提高型转变的思考·····	51
中国高等教育结构的战略性转变·····	59
儒家教育传统及其当代意义·····	68
“为公立学”是我们的旗帜	
——评“教育产业化”·····	78
增强使命感责任感 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性研究·····	89
关于我国高等教育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改革发展的思考·····	97
关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认识与思考	
——在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的报告·····	107
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挑战与对策·····	126
近代大学校长和教育家对中国教育传统的认识·····	146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切实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	161
关于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几点建议	
——在温家宝总理主持的教育座谈会上的发言·····	165
建设和谐文化 引领大学发展·····	175
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做强我国高等教育的大政方针·····	187
关于我国研究生学科专业设置问题的思考·····	205

变革的时代呼唤宁静的校园·····	217
谈谈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与现状	
——在孔子学院院长研修班上的讲演·····	224
发展高水平大学 促进高等教育办好做强·····	238
论提高大学教学评估的科学性·····	245
2020 年我国高等教育规模预测分析 ·····	250
大学自主性与可持续发展·····	262
关于营造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宏观环境的政策思考·····	265
以《规划纲要》指导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	
——在《人民日报》“专家献计《规划纲要》座谈会”上的发言 ·····	272
更多关注教育深层次问题·····	281
关于学术权力的几点思考·····	283
高校去行政化真正含义是按教育规律办教育·····	292
以更加开阔的视野认识创新人才的选拔和培养·····	295
全球化背景下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再认识·····	302
通过素质教育培养和谐发展的人·····	308
为建设“人民满意、世界一流”大学而努力奋斗·····	316
为制度化开展国学教育与研究留出一席之地·····	325
深刻认识大学的文化传承创新职能·····	330
关于全球化背景下大学文化交融功能的几点认识·····	336

议案与建议

确保 4% 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和 1% 的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 ···	347
建议修改《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五十一条的议案·····	352
再次建议修订现有学科目录，增设国学学位·····	355
关于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的建议·····	361

后记·····	366
---------	-----

当前发展高等教育的三项政策选择*

A: 关于资金投入的政策选择

政府加大投入是首要的政策选择

教育是一项公益事业，发展教育是政府的基本职能和不可推卸的责任。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十分重视教育，世界各国财政性教育支出平均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重多年前就已达到5%以上。

尽管我国历史上的这一比重曾经达到3.43%（1986年），但90年代以来，却是下降的趋势（虽然绝对额一直在逐年增加），1995年跌至仅占2.41%的谷底，1999年虽已回升到占GDP的2.79%（GDP与GNP略有差别，这里忽略不计），但这个比例依然只相当于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的水平，距离1993年我国政府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规定的4%的目标，尚有很大距离。即使实现了4%的目标，也仅相当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目前美国的这一比例是5.8%，其中40%用于高等教育；在我国2.79%中，也仅有19%左右用于高等教育。政府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导致高等教育资源严重不足，高校办学经费普遍短缺，处于“紧运行”状态中。特别是近两年的超常规快速发展（1999年在校生规模比上年增加21.3%，今年又比去年增加10%左右），许多高校在可

* 2000年12月5日，本文以《怎样把高等教育这块“蛋糕”做大》为题发表于《经济日报》，2001年第15期《经济研究参考》摘其中的主要观点，转发《教育产业不能“市场产业化”》一文。

持续发展方面已经难以为继。可以说，长期的政府资金投入不足，是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基本原因之一。

因此，我过去认为、现在仍然坚持认为：在资金投入问题上的首要政策选择，是政府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尽快实现上述 4% 的政策目标。

当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要花钱的地方实在太多。面对这样的矛盾，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基于教育的基础地位、战略地位而提出的著名的政策选择是：宁可经济建设等方面的发展速度放慢一点，也要把教育搞上去。江泽民主席最近指出，教育是崇高的社会公益事业，是一种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的知识产业。朱镕基总理宣布，本届政府实行教育经费支出占中央本级财政支出的比重每年增长 1 个百分点。这带动了许多地方政府增加对教育的投入，全国财政性教育支出占 GDP 的比重由 1998 年的 2.55% 提高到 2.79%，一年提高了 0.24 个百分点。如果每年都能保持这种增长幅度，只要六七年的时间就可实现上述 4% 的目标；与此同时，再稍稍提高高等教育支出在整个教育支出中的比重，再加上多渠道筹集办学经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目标（即大学毛入学率达到 15% 以上），就肯定可以同步实现。

这主要取决于政府的投资结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财政本质上是公共财政。只要尽量减少乃至杜绝长期以来大量存在的重复建设和“投产之日就是亏损之时”的大型企业项目，甚至在必要时适当推迟几个大项目的上马，在经济正常发展的前提下，连续几年保持上述 0.2 个百分点以上的增长速度，是不应当有太大的困难的。与此同时，应力求在改革计划经济时期形成、至今仍在沿用的行政拨款办法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探索类似于发达国家的“拨款委员会”或其他新的拨款制度。

贯彻“科教兴国”战略，要落实在行动上。我们呼吁，在各级政府机构重视对教育投入的同时，要加大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同级财政

预、决算的审议力度，加大对有关政府部门财政行为的监督力度，确保 4% 目标的实现。

“穷国办大教育”应坚持几个“并举”

毋庸讳言，实现上述 4% 的目标需要一个过程；而即使实现了 4% 的目标，也不足以保质保量地实现 15% 大学毛入学率的目标；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继续实现 20%、30% 乃至更高水平的中长期目标。所以，仅靠增加政府投入来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是不行的。

因此，在资金投入问题上的另一项重要政策选择，就是实行多渠道筹集办学经费，坚持“两条腿走路”的发展方针。其具体内涵可概括为若干个“并举”：

政府投入与学生适当缴费并举；全日制教育与非全日制教育并举；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并举；正规学校教育与自学考试制度并举（我国从 1983 年起，正式实施高等教育国家自学考试制度，这是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创举）；传统的学校教育组织形式与函授教育、现代远程教育并举；大学学历教育与高中后职业资格培训并举；学校培养学生与学校增强社会服务功能并举，等等。

这些“并举”增加了社会对教育的投入，增强了学校自筹经费的能力，也有利于提高投入资金的利用效率。目前，我国公办大学的经费支出中，财政拨款已经下降到平均占 65% 左右；许多大学甚至只占 50% 左右。这些“并举”应当坚持，因地制宜、因校制宜地扩展，并在实践中不断地完善和规范。

我以为，上述两项政策选择是同等重要的。然而，现在人们似乎更多地对后者感兴趣。这当然也是必要的，因为这里包含着教育的若干制度创新的问题。应该支持和鼓励创新，但如果只是强调后者，而对前者很少论及，甚至有意无意地加以回避，则是令人担忧的。

教育产业不能“市场产业化”

在这里，不能不提及所谓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问题。把教育称作“产业”，只是“产业”这个概念的泛化，与工、农、商这些原本意义上的产业有很大区别。这是因为人们在计算国民投入与产出时，把教育列入第三产业。但切不可望文生义，以为既然教育也是产业，就应当“产业化”，就是要用办企业的办法来办学校，要求货币形态的投资回报，甚至“把高等教育办成最赚钱的行业”。这是极其片面的。

为什么不能片面地提倡教育“产业化”、“市场化”呢？这是因为教育一方面具有商品属性，它具有与私人产品相同的一些属性，从谁消费谁能受益的意义上讲，教育可以定价，可以收费，我们现在要求非义务教育阶段按照培养成本的一定比例来缴费上学，理论上就是这个基础。但更重要的在于另一个方面，教育还更多地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它的消费结果具有很强的外溢性，就是不仅受教育者本人会从中得到好处，社会也会从中广泛受益。因而，公民的受教育水平愈高，整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就愈高。所以经济学把它定为“准公共产品”。此外，教育具有“教化”的功能，对形成和改造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具有重大作用；教育对人类文明的积累、传承也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这一切都决定了它不能像私人产品一样产业化、市场化。

在现代社会，几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负责的政府，都把发展教育看成是自己的基本职责之一，最重要的公益事业之一，也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对自己的国民实行教育“产业化”、“市场化”政策。即使是世界各国的私立学校，大多也都不是私人的产业，而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公共资产，并且一般都是非营利机构。

我国高等教育长期处于严重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学校长期苦于投入不足；在一些企业的投资意向面临市场需求不旺、投资风险很大的情况下，以营利为目的投资办教育，便应运而生了；而一些学